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
时论选集

一 上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
時論選集

第一卷

上册

張枬 王忍之編

一九六〇年·北京

辛亥革命后十年间
时论选集

第一卷

下册

張枬 王忍之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六〇年·北京

學愛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

第一卷

(上、下兩冊)

張 枋 王忍之編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理

*

開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 印張31 $\frac{3}{8}$ · 插頁11 · 字數743,080

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1—5,000 定價(大)4.50元

統一書號11082·287

編輯說明

这部“选集”的編印，是为了給研究辛亥革命的同志，研究1901到1911年間，在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国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想发展史的同志，提供參考資料。“选集”的主要內容是表現这个时期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各个派別的政治、道德、文化、哲学观点的論文。

“选集”的材料来源主要是1901年到1911年間出版的期刊，兼收当时出版的影响較大的革命書籍。所选录的主要是当时出版的期刊和書籍中，直接而集中地表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观点的論文。此外，从当时的翻譯著作、历史著作、学术著作，以及小說、戏剧、詩歌等作品中，也能窺見当时思想潮流的趋向；但是，为了不使“选集”的篇幅过于浩繁，內容过于庞杂，所以除了个别的例外，一般不予收录。基于同样的理由，“选集”沒有直接从当时出版的报纸中收集材料，只收录了一些轉載于書刊中的报纸論文。

“选集”是編年体，在每年中先期刊，后書籍。期刊以創刊時間的先后为序，書籍一般以出版時間的先后为序。每篇文章后所注的出版時間，都是阳历。全書共分三卷：第一卷自1901年到1904年；第二卷自1905年到1907年；第三卷自1908年到1911年。每卷卷首有介紹該卷內容的序言，卷末有書刊的簡單介紹。

收入“选集”的文章，有些原文过于冗长的，在收入本書时，曾經編者刪节（这在書里是注明了的）；个别无关紧要的注解也刪去了（这在書里是沒有注明的）。所有的文章都重新加了标点，原文

4628/06

未分段的重新分段，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錯別字。文章作者的署名照原文排印，其真姓名則在括号內注明。

編者所見到的材料并不完全；选择一定有不够精当之处，缺和滥的情形都是可能有的。編者恳切地期待着讀者对編輯工作的缺点和錯誤的批評。

編 者

一九五九年三月

第一卷序言

—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古老落后的中國一步一步地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中國人民為了爭取民族的獨立，為了擺脫貧困屈辱的生活狀況，從來沒有停止過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鬥爭。在義和團運動以後，中國人民的反抗鬥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即民族資產階級領導中國革命的時期。

從鴉片戰爭後到義和團運動為止，中國革命的主角一直是農民。農民群眾發動了太平天國革命和義和團運動，沉重地打擊了封建統治和外國侵略者。但是農民是分散的小生產者，不是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單純的農民革命，提不出一個不僅在破壞舊的而且在建設新的社會制度方面都明確可行的革命綱領，來指導鬥爭，團結群眾，戰勝敵人。因此，每一次農民革命最後都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聯合力量的鎮壓下失敗了。

在這個期間里，隨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走上政治舞台。義和團運動的前幾年，維新志士康有為、梁啟超等領導了以挽救中國危亡和發展資本主義為目的的變法運動。但是，當時的維新志士不是革命者，而是改良主義者。他們——剛從地主階級中蛻化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和開明士紳——小心翼翼地將發展資本主義的主張限制在不根本動搖封建制度的框子裡。他們所領導的變法運動，在當時是一個進步的運動。但是，維新志士對於農民群眾抱着害怕和敵視的態度，他們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封建

皇帝身上。因此，他們領導的改良主义的变法运动，在遭到封建反动势力的反击后，很快就失败了。

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革命派。它自觉地起来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发动农民和工人的工作。这时，工人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农民群众中间蕴藏着的巨大力量有待于在先进阶级领导下得到发挥。因此，这时候，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成为政治舞台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角色，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这个时候出现，是和当时中国社会的整个政治形势分不开的，是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的。

义和团运动后，清王朝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宣布实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就是取消满汉不得通婚的禁令、废科举、兴学堂等类的枝枝节节的改革。这些“新政”当然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起色，也没有能使人民受骗，就是统治阶级也不觉得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它认为维持统治的最可靠的保障，还是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其办法就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义和团运动中嚐到了中国人民拳头的滋味，又看到清王朝矢忠矢信的表现，认为维持清王朝更便于奴役中国人民。它向清王朝索取巨额的赔款和矿山、铁路、航运、财政、金融等主权。清王朝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帝国主义的要求。1900年以后，清王朝彻头彻尾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驯服的鹰犬，它的反动的卖国的本质彻底地暴露了。

帝国主义为镇压义和团起义所发动的战争，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以前任何一次侵略战争。八个国家的联合进攻，首都失陷，皇帝、皇太后逃亡，使中国人感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规定中国要偿付巨额的赔款，并同意帝国主义国家

在北京、天津等重要地点驻扎军队。辛丑条约后，中国形式上维持着独立的面目，实际上已处于被各帝国主义国家瓜分的局面，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兴建铁路、开办工厂、创立银行，并且为分割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激烈地进行着明争暗斗。中国人懂得，民族的灾难不是减轻了，而是空前加深了。为了支付巨量赔款而实行的普遍的加捐加税，使广大社会阶层的生活更行恶化。作为反抗，农民群众举行了此起彼伏的抗捐反教暴动，城市工商业者和其他居民使用了罢市、罢捐的武器，就是中小地主也在寻找改变困境的办法，而知识分子则纷纷出洋留学去探求救国的道路。不满情绪、革命因素到处都在急剧地增长着。

这样的政治形势，在资产阶级中间引起了特别深刻的变化。在1901到1904年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中国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在经济上就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是由洋行买办、封建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高利贷者转化而来，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密切的联系，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另一部分多半是由手工工厂的业主、中小商人等发展而成，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资金不多，处处感到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侵略对自己事业的压抑。经济地位的不同，决定了资产阶级的这两个部分在政治上也一定要发生分裂。十九世纪末，康有为、梁启超等热中于不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变法活动，而孙中山创立了兴中会，发动了起义，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分裂的端倪。不过，当时孙中山的影响不大，他所依靠的主要是华侨中的中小业主和职员，在国内他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支持。改良主义在整个资产阶级中间，占有压倒的优势。1900年后，局面就改变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的后一部分力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民族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尖锐化，以及清王朝反动面目的彻底暴露，使

得資產階級的后一部分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走上了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國內和國外都出現了不少革命團體，出版了很多革命刊物和書籍。在1903到1904年間，革命書刊的發行盛極一時。到了這個時候，代表和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有密切聯繫的大資產階級利益的改良派是一方，代表中等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利益的革命派是一方，兩軍對壘的局面比較顯著地形成了。資產階級革命派起來領導革命了。

在這幾年里，資產階級革命派認真地思索了救國的道路，提出了革命的綱領，他們深信自己事業的正確，並為清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表現出了英勇的革命精神。可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就是在其向上的、發展的、青春時期里，也無例外地表現了由他們的階級地位賦予他們的軟弱性和妥協性。資產階級革命派在這幾年里的活動表明，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動搖妥協的一面，是資產階級革命派與生俱來的本質。

革命派怎樣形成，它的綱領是什麼，它對革命的力量、手段及其他有關革命的問題提出了那些主張，它的革命性和軟弱性怎樣表現，改良派在這幾年里如何動作，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的關係怎樣，這些問題，從它們出版的刊物、書籍中間可以看出一個大概的眉目。“選集”第一卷的主要內容，就是說明這些問題的一些比較重要的材料。

二

1901到1904年間出版的改良派的刊物有“清議報”、“新民叢報”、“外交報”、“東方雜誌”、“揚子江”等（前二種在日本橫濱出版，後三種在上海出版）。

在這些刊物上，改良派的領袖康有為、梁啟超及其附和者，繼續宣傳自己的老主張——勸導清王朝實行變法，希望通過君主立

宪为大资产阶级争得一些权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一条隙缝。他们虽然泛谈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是其目的或者和戊戌变法时一样，是用它来说服清王朝实行改革，或者是用它来恐吓革命者，说革命一定要导致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后果。对于帝国主义，他们最多也不过提出一些不会损害帝国主义根本利益的、号称“文明排外”的措施。他们也没有从清王朝对戊戌变法的镇压以及1901年以后的伪改革中吸取教训。有些人仍然认为，只要圣明的光绪皇帝能够当权，就会诸事顺利。有些人虽然对清王朝的改革诚意感到失望，但是认为依靠“愚昧的人民”更不会有什么成就。革命，万万不能行；立宪，政府不愿意，人民没有资格；于是，有的人说不如干脆专制；有的人说只有慢慢教育国民才是出路。总之，他们在1900年后没有任何长进，相反，随着革命潮流的蓬勃发展，逐渐把自己的主要精力用来反对革命。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人民一旦起来革命，不仅清王朝要复亡，就是他们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和他们所要维护的封建统治也会有没顶之祸。

在这几年里，康有为发表的主要文章有“公民自治篇”、“官制原理篇”、“辨革命书”。在前二篇文章里，康有为说：只有开议院，才能巩固封建统治；行“公民制”，君忧可免、君权益尊、君利益大。不然的话，等到人民起来争民主权利的时候，那就会有“土崩瓦解之忧，君弑国亡之乱”了。在“公民自治篇”这篇文章里，康有为规定只有达官、贵人、名士、富豪才有当选为议员的资格。这最明白地表明了改良派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阶级实质，他们所要召开的议会无非是绅士会议。在“辨革命书”中，康有为猛烈地攻击革命派，说主张推翻清王朝是“大怪不可解之事”：一则因为清王朝历来对人民就是仁至义尽的，光绪皇帝更是曠世之圣主；二则因为开议院无须革命就能得到，1900年以后清王朝实行“新政”就是明证；三则因为革命就会亡国。康有为在这时候，由于公开地为清王朝

辯护，赤裸裸地反对革命，就不能不开始丧失他在戊戌变法时获得的声望，遭到了进步輿論的唾弃。接替康有为的地位，在改良主义思想营垒中充当主帅角色的是梁启超。

1901到1902年間，梁启超在他主編的“清議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論”、“过渡时代論”、“新民說”、“論立法权”、“敬告当道者”、“論专制政体有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释革”等文章。在这些論文里，梁启超用自己的語言重复了康有为唱的老調。他实际上也是劝告专制統治者說，披上一件立宪的外衣对統治者最有利，不然就会起革命，皇帝就会有如象路易十六的下場。不过徒弟比师父聪明。梁启超看到了人民对清王朝的普遍不滿，看到人民“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的大势。他認為在这样的情形下，自己有必要把調子唱的高些，动听些，以便爭取群众的同情，以便尽快地惊醒不識时务的清王朝，促使清王朝向改良派讓步。所以梁启超在自己的文章里，斥責清王朝的伪改革，高談民主自由，甚至于提倡“大变革”、“大破坏”。其实，梁启超攻击清王朝的伪改革是因为在他看来，伪改革是危险的玩火，会使清王朝信誉扫地，一发不可收拾，终于引出革命的大祸。他說：“改革……苟文而不实，偏而不全，优柔焉而不断，則未有不为大乱之阶者也。”又說：“西人有恒言曰：‘改革之业，如轉巨石于危崖，非达其目的地則不止’”（“敬告当道者”）。梁启超所提倡的“变革”、“破坏”的实际內容不过是改良派领导的君主立宪。用他自己的話来說，就是由“不忍破坏之仁賢者”所实行的“无血破坏”。他想用这种“无血破坏”来偷換、抵制、取消他所畏若蛇蝎的“有血破坏”——农民革命。

其他有些改良派分子，甚至对于梁启超的这种貌似激烈的言論也感到害怕。梁启超的同志黄遵宪在1903年初写了一封信（即“駁革命書”）給梁启超。象梁启超責备清王朝玩火一样，黄遵宪說，梁启超的危言聳听也是玩火，劝他更加审慎一些。同时，梁启

超的言論在一个短时期虽然起了一些迷惑作用，“新民丛报”曾經风行一时，但毕竟沒有能抑制革命潮流的发展。于是，梁启超就急急忙忙地公然地向革命开火了。

1903到1904年間，梁启超发表了“敬告我国民”、“論俄罗斯虛无党”、“新大陆游記”、“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在这些文章里，梁启超旁征博引反复申述的思想是：(一)中国人民沒有享受民主自由的資格，即使推翻了清政府也沒有能力建立民主的新国家，所以革命是不必要的，不如由清政府实行“开明专制”好；(二)“后膛枪出而革命絕”，政府有力量镇压革命，革命队伍里有种种困难，所以革命是决不会成功的；(三)中国一旦发生革命就会引起农民大暴动，結果就会蹂躪全国，外国乘机灭亡中国，所以革命是极可怕的。他說：正是因为这个緣故，他才对“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慄”的。至此，资产阶级改良派由于鄙視人民、敌視人民、害怕人民革命，終于成为革命的坚决反对者的面目，就暴露无遺了。

康、梁所宣传的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外交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揚子江”等报刊的附和。这些报刊的宗旨和康梁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話，那就是它們处在清王朝的直接統治下，所以无論是諂媚清王朝，或者是反对革命，往往都表现得更加明显。

三

1901到1903年初出版的、革命傾向比較显著的刊物和書籍有“国民报”、“游学譯編”、“大陆”、“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苏”等(这些書刊，除“大陆”“童子世界”外，都在日本出版)。

这些刊物的创办人和撰稿人，有不少原来是改良主义者。例

如“国民报”的編輯沈翔云、秦力山等，在1900年时是属于康有为系統的自立軍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庸書”作者，“国民报”的撰稿人章太炎，在1900年以前，如他自己所說，曾“与尊清者游”。“游学譯編”的編輯，“新湖南”的作者楊篤生，在戊戌变法时期是梁启超主办的时务学堂的教习。这些刊物的有些創办人，在十九世紀末虽然沒有参加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但也大抵受过改良主义的熏陶。時間过去了不过一二年，他們在出版上述刊物和書籍时，就其主要傾向來說，已經是以革命鼓吹者的面目出現了。从这些書刊中可以看出：他們大都是从拯救中国免于灭亡的爱国主义出发，在認清了清王朝的反动的卖国的本質后，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君主立宪思想，达到了推翻清王朝的革命結論。

在这些書刊里，我們到处可以看到革命志士对于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危局的沉痛陈述。他們或則列举帝国主义对中国領土主权的掠夺，或則指出在帝国主义經濟侵略下国計民生的凋敝，或則用别的殖民地国家的情形來說明亡国的可怕。他們說帝国主义是不顧天理、不講文明、不依公法的强盜主义。他們大都能够看出帝国主义不直接瓜分中国而維持清政府，不是出于什么好心腸，而是因为害怕中国人民的反抗，是利用清政府作为統治中国的工具。他們指出，这是更加阴险、更加毒辣、更加巧妙的灭亡中国的办法。他們常常引用清朝統治者“量中华之物力，結与国之欢心”，“宁贈友邦，勿与家奴”这种无耻的昏話，常常引用清王朝唯帝国主义之命是听的种种事实（如教案听外人裁決，督撫仰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索取，賠款代外人搜括等）来証明清王朝是帝国主义的傀儡。于是，他們有的說：清王朝的所作所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章太炎：“正仇滿論”）；有的說：“日日安坐而望滿政府，則亦日日安坐而就屠割”（“新湖南”）；甚至說：“外人不过間接以亡我，而政府乃直接以亡我”（“湖北学生界”，“論中国之前途及国民应尽之責任”）。

清朝統治者和帝国主义的勾結激起了他們的仇恨心，清朝統治者对戊戌变法和自立軍的鎮压，擦亮了他們的眼睛。他們指出，戊戌变法的失敗証明了清王朝不願意、也沒有力量做什么真正的改革，等待清王朝立宪是十足的癡心梦想；即使清王朝能搞一些兴学校、办报纸、开議院、立宪法之类的变法，也仍然摆脱不了奴隶的命运。他們認為，唯一的出路是革命。他們用不同的語言表达了这个思想。有的說：“欲立新国，必自亡旧始”（“国民报”；“中国灭亡論”）。有的說：“非躬执大鐮以扫除其故家污俗，而望禹域之自完也，岂可得乎！”（章太炎：“正仇滿論”）。有的說：“暴动而后能有所創立，有所成就”（“新湖南”）。有的說：“外拒白种，內覆滿洲”（“童子世界”；“为外人之奴隶与为滿洲政府之奴隶无別”）。

就这样，帝国主义、清朝統治者，违反了自己的本心，充当了反面教員，有的以侵略行为，有的以卖国勾当和对变法活动的鎮压，教育了中等资产階級和小资产階級，把他們推向革命。

从这些刊物中可以看出，革命分子从西方资产階級的革命武庫中取出了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作为論証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的工具。他們以西方资产階級的革命历史和革命学說为根据，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統治，认为民族民主国家的建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們說，只有建立民族的民主的国家，給人們以民主权利，才能动员人民起来抵抗外来的侵略。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革命者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资产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要求和利益。

革命思想的兴起是一个曲折的过程。这些刊物的基本趋向是革命的，但是，如果我們比較仔細地考察这些刊物上的文章，那末它們的情形远比上面談到的要复杂。我們可以看到：在同一刊物上，有些文章表現了充沛的革命精神，另一些文章却在宣揚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救国等庸俗的改良主义綱領；同一作者在

一个时候发表了激烈的革命言論，另一个时候却又表現出了改良主义的动摇；就是在一篇文章里，在闡述革命思想的同时，有时也会帶上一些改良主义的杂质。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主張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者中間，有的表现了强烈的建立共和国的民主主义思想，有的却只有建立汉族帝国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他們輕蔑地錯誤地看待国内的少数民族和当时的某些弱小国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許多革命分子是从改良派轉化而来的，他們沒有很快扫清各种改良主义的幻想；而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資產階級在有革命性的一面的同时，还有軟弱动摇的一面，因而資產階級的革命分子也就不可能彻底地抛弃掉改良主义思想。

1903年4月，清王朝和俄国的沙皇政府訂立了新的卖国条約。同时，广西巡撫王之春邀請法国軍队鎮压广西的农民起义，交換条件是把广西的铁路矿山权送給法国。1904年，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訂立的虐待和歧视华工的条約期滿了，美国企图在新訂条約中繼續保持虐待华侨的条款。于是，在1903年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报刊上，特别是华侨办的报刊上，不断刊載反抗美帝国主义虐待华侨的文章。1903年6月，清王朝下令逮捕参加拒俄、拒法运动的爱国青年。这些事件，再加上上面談到的改良主义者对革命的接連不断的恶毒攻击，再一次刺激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1903年春夏間，在上海出版的、有几年历史的“苏报”轉变成成为革命报纸；邹容的通俗小册子“革命軍”，章太炎的論文“駁康有为書”，也在这个时候出版了。清王朝封閉了“苏报”，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这反而使革命派的声势大振。苏报案后，邹、章的文章膾炙人口；出版了一批新的革命書报，如“国民日报”、“黄帝魂”、“覺民”、“中国白話报”、“女子世界”等；就是早先出版的“浙江潮”、“江苏”等刊物的言論，比从前也更加激进了。

从这些革命書刊中可以看出，这个时候的革命派已經不是初

出娘胎的童稚，而是血气方刚的青年了。改良主义的动摇比較少了，意見趋向一致，革命思想的闡述比从前更加犀利明快，对清王朝的攻击不再“务为蘊借”，而是“辞多恣肆无所迴避”了（章太炎：“革命軍序”）。

在“革命軍”、“駁康有为書”、“讀严拿留学生密諭有憤”（“苏报”）、“革命其可免乎”、“露西亚虛无党”、“新政府之建設”（“江苏”）、“民族主义之教育”（“游学譯編”）等文章中，革命者憤怒地指責了清王朝对人民的压榨和卖国行为，深刻地揭露了“新政”的虛伪性和欺騙性，激烈地反对清王朝对爱国运动和革命者的镇压，指出它只会坚定革命者的斗争意志。这些文章，不只热情地歌頌了革命，表现了革命志士赴湯蹈火在所不辞的英勇精神，而且比較明确地提出了他們的革命政綱（它特別清楚地写在“革命軍”这本小册子里），它的中心就是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从这个时候的革命書刊中可以看出，革命者不放过每一个細小的可以宣传革命思想的机会。他們号召剪去发辮，說发辮是清王朝奴役中国人民的标记。他們反对用君主年号紀年，主张改用黄帝紀年，說以君主年号紀年是专制主义的标记。他們在刊物上刊載了史可法、郑成功、閻应元等民族英雄的象片和传记，介绍王船山、黄梨洲的学說。他們在自己的文章上使用了“革命軍馬前卒”、“汉种中之一汉种”、“轅孙”、“汉駒”、“激烈派第一人”等笔名。他們用这些来动员人民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也用来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

这个时候，革命者已經清楚地認識到，改良主义是革命的大敌。紧接着章太炎的“駁康有为書”，革命报刊差不多都发表了尖銳地批駁改良派的論文，例如“苏报”的“康有为”、“駁革命駁議”，“浙江潮”的“近时二大学說之評說”，“江苏”的“中国立宪問題”等。在这些文章里，革命者回答了改良派对革命的种种責难，进一步論